

中國古代的官府藏書與私家藏書

Official Collections and Private Collections in Ancient China

蕭東發

Dong-fa Xiao

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brary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Peking University

袁逸

Yi Yuan

浙江省圖書館副研究員

Associate Research

Library of Zhejiang Province

【摘要 Abstract】

本文概要地回顧了官府藏書和私家藏書形成的歷史與發展脈絡，分析了各自特點及缺陷；在論述官藏與私藏之間的密切聯繫與相互影響時，例舉了清乾隆皇帝對古代私家藏書的關注、鼓勵與利用，同時也肯定了私人藏書家對古代典籍的保存、傳播、完善、生產與捐公等方面的諸多貢獻。特別指出官藏時斷時續、旋聚旋散，階段性和周期性較為明顯，而私藏的連續性要強些。取之不盡的文獻資源在民間。

The article reviews summari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fficial collections and private collections in ancient China, and analyzes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shortcomings. The official collections and private collections were intimately related and influenced by each other. An example is given that Emperor Qianlong of Qing Dynasty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private collections, and took care to encourage and utilize them. Moreover, the authors affirm the private collectors' contribution to ancient books in the fields of conservation, communication, perfection, production and donation to the government. The article points out particularly that the cyclical character of the official collections was very obvious because they were gathered and scattered quickly and alternately. Whereas the continuity of private collections was better. The abundant document resources derive from the folk.

關鍵詞 Keyword

中國 古代 官府藏書 私家藏書 藏書家

China ; Ancient times ; Official collection ; Private collection ; Collector



中國的藏書事業傳統悠久，生生不息，業績輝煌。從殷商時代的甲骨藏室算起，迄今已有三千四百餘年歷史。中國的藏書事業似一條滔滔大河，聚匯條條支流，波濤漸寬，聲勢漸壯，由官府藏書而私人藏書而寺觀藏書而書院藏書，隨歷史的進程而不斷壯大發展。黃河九曲，中國的藏書事業同樣歷經種種磨難曲折，天災人禍終以百折不回萬劫不滅之氣勢，頑強走完了自己漫長而光榮的路程，並功德圓滿地完成了向現代圖書館的嬗變。

中國古代的藏書事業的整體由官府藏書、私家藏書、寺觀藏書、書院藏書四個系統組成，各個系統的先後培育與發展又與一定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背景密切關聯。

壹、官藏系統

這是以皇家藏書為主的政府藏書體系，也是我國發育最早的古代藏書體系。發掘於河南安陽小屯成批的殷商甲骨和陝西岐山縣鳳雛村的周原甲骨，可視為後世國家圖書館的雛形。不僅商周的中央政府即設有藏書室，其時，各諸侯國也多設政府藏書機構，若魯、秦、宋、晉、楚等國皆然，尤以國收藏之典籍更豐富。至西漢，自高祖劉邦立國至成帝約二百年間，漢王朝先後興建多處專用藏書樓如石渠閣，天祿閣等，廣征天下遺書，編制國家藏書目錄，成效顯著，為古代藏書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此後，歷代皇家藏書在更替、繼承中續有發展，形成各自特色。如隋代皇家秘閣按圖書內容分庫管理之首創，唐代官府藏書以安史之亂為界由極盛而劇衰的特點，宋代中央政府藏書與地方官府藏書之交相輝映，明代皇史宬「石室金匱」形制的繼承與發展，清代皇家七閣之規範建置，南北分設，不斷地充實、豐富和完善了官府藏書系統。清末京師圖書館及江南圖書館等的建立則標識著中國官府藏書系

統從中央到地方的全國轉型，古代藏書樓的終結與更生亦同時完成。

歷代官府藏書因有政府權力與國庫資財的強力支持而藏書豐厚、設施完善、人材優秀、管理先進，成為我國古代藏書的主流系統。但官府藏書普遍存在兩大缺陷，一是深藏秘閣，基本不對社會開放，因而極大地削弱了藏書功能的發揮。並且，由於其所處的中心地位，因而對歷代各類藏書樓長期、總體的封閉性、保守性起著不容忽視的示範作用，進而對中國典籍與文化的傳播產生負面影響。一是由於集中度藏、地處政治中心的特點，使其極易遭受毀滅性災難。歷史上幾乎每一次的改朝換代、內亂外侮都使官府藏書嚴重受損，歷代一些著名的「書厄」也大都是中央政府藏書的慘劇。

貳、私家藏書系統

我國私人藏書的出現稍晚於官府藏書。春秋戰國時期，隨學術下移民間，百家爭鳴、諸子競說的較為自由、開放的社會氛圍為早期私人藏書的滋生提供了合適的土壤，惠施、墨子、蘇秦等便是私人藏書的早期代表。其時，私人藏書規模既小，又普遍無專門的藏書建築，處於較為原始的簡陋狀態，從藏書規模多以「車」、「篋」計的記載即可明瞭。

漢代，大一統的安定環境及允許民間藏書的寬鬆政策使私家藏書迎來了第一個黃金時期。洛陽槐市等民間書肆的出現及大量「傭書」人以抄書為業的事實即是當時民間藏書蓬勃發展的有力佐證。這一時期，皇帝開始以賜書的形式褒獎臣屬，表明了對私人藏書的實質鼓勵與支持，如蔡邕即曾得朝廷賜書四千餘卷。這一做法也從此為歷代君主所仿效，至清代乾隆年間朝廷賞賜臣民《古今圖書集成》等巨帙而達巔峯。朝廷賜書由此也成為私家藏書的一個來源和一大特色。儘



管就總體而言漢代的私家藏書規模仍不大，但個別的藏書大家已嶄露頭角，如河間獻王劉德，其專門的民間徵書措施、富比朝廷的藏書規模，既是當時私家藏書的一杆旗幟，也有力地說明私家藏書系統的主幹已逐漸形成。不難想像，象河間獻王劉德、淮南王劉安等人的家庭藏書已設有專門的藏書樓以放置。

唐代，科舉制度的實施極大地刺激了民間讀書應試的積極性，而當時教育事業的不發達又促使稍具條件的家庭熱衷投資藏書以供自學，由此便有了私人藏書的又一個黃金時期。此後，科舉制度似與私人藏書結下不解之緣--歷代產生進士、狀元最多的地方也總是私家藏書最為發達的地區。以明清兩代為例，明代共產生狀元 89 名，其中浙江 20 名，江蘇 16 名，江浙兩省共 36 名，占總數的 40% 強；清代共有狀元 114 名，其中江蘇 49 名，浙江 20 名，江浙兩省共 69 名，占總數的 60.5%。換句話，明清兩代共有 203 名狀元中，江浙兩省占有 105 名，超過半數。天下文狀元，二人有其一！明清時期江浙文化的強勁優勢顯現無遺，江浙私人藏書中心持續繁榮的因果也就有了很有說服力的注解。

宋代藏書事業得益於雕板印刷的初興繼續加速發展。這一時期私人藏書有兩點值得一提，一是隨南宋建都臨安，私家藏書中心偕官府藏書中心正式南移，並由此奠定其後六、七百年間江南地區私人藏書事業長期發達的局面。二是私家藏書目錄的編制取得一系列突破性進展，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之先開題要之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之首創解題一體，尤袤《遂初堂書目》之獨擅版本記載，一掃前此官藏書目一統天下、孤掌難鳴的沉悶，也極大地改變了私家藏書系統長期以來有藏書無學術難登大雅之堂的簡陋形象。由此發端，後之私家藏書編目遂形成制度，書目成果多若繁星，官、私藏書目錄也從此形成

並駕齊驅、各領風騷的格局。

明清時期的私人藏書事業呈現持續發展，漸趨鼎盛的態勢，期間雖有明末清初的曲折頓挫，但長期積累形成的堅實藏書基礎以及業已扎根民間的藏書傳統使私家藏書事業於戰亂後迅速恢復元氣，並以更猛的勢頭由東南而席卷全國。該時期私家藏書事業不僅表現為藏書家人數空前增多，藏書中心地域色彩愈顯突出，更有以下幾個特徵引人注目：

一、藏書樓規模普遍擴大

藏書大戶群雄並起。明代的毛氏汲古閣，祁氏淡生堂、范氏天一閣，清代的錢氏絳雲樓、朱氏曝書亭等均稱盛一時。清代中、晚期，更分別有四大藏書樓鶴立雞群，乾嘉四大家有吳縣黃丕烈、袁又愷、長沙周仲連、元和顧抱衝，晚清四大家有聊城楊紹和海源閣、常熟瞿鏞鐵琴銅劍樓、吳興陸心源、甬宋樓、杭州丁丙八千卷樓。這些藏書巨擘均以藏書量多（十數、二十餘萬卷），藏書質量高（宋元珍本數以百計）著稱當時後世。

二、藏書學術的總結與研究逐漸活躍

學術大家輩出，學術成果斐然。從明代胡應麟、謝肇淛到清代錢曾、洪亮吉等人爭相嘗試對藏書家種類的劃分便是藏書家們總結歷史、審視當代、知照自身、警策同行的積極入世姿態的寫照。明祁承業《淡生堂藏書訓略》、清孫從添《上善堂藏書紀要》以實用為要旨，分別對藏書技術的方方面面作了詳解，可視作歷代藏書技術的歸納與集成。至清末，葉昌熾《藏書紀事詩》、葉德輝《書林清話》的相繼問世，則標識著我國古代藏書樓研究新紀元的開始。

此外，乾嘉時期黃丕烈之題跋、顧廣圻之校勘，錢大昕之考證俱是藏書家學擅專長，卓有成



就的極好典範。

三、藏書家中有越來越多的人具有開放識見

藏書貴流通，藏書惠士林的意識日趨自覺，濃厚，更多見諸行動。周永年的《儒藏說》與徐樹蘭的《古越藏書樓》可視為藏書向公眾開放的理論與實踐的兩個典型。

四、乾隆的非凡功績

這裡，筆者無意也無從評述乾隆的功過是非，僅就其對我國藏書事業特別是私家藏書事業的傑出貢獻略作概述。可以這樣說，歷代帝王中從來沒有一個人像乾隆那樣對私人藏書如此熟知、關心、利用、鼓勵、優惠。講三點足矣。

(一)乾隆對藏書家的隆重褒獎極大地鼓勵，刺激了當時其後全國範圍私人藏書事業的迅猛發展。對響應朝廷號召呈獻家藏於《四庫全書》的一些主要藏書家，乾隆破天荒地給予了物質和精神的雙重獎勵，物質獎勵是賜予武英殿版《古今圖書集成》、《佩文韻府》等巨編，事實上已至少從數量上彌補了藏書家獻書的損失。並且，由於此項賜書的大事聲張，造足輿論，藏書家在榮譽上的獲得已遠勝於物質上的收穫。更為重要的是，按乾隆論旨，《四庫全書總目》中一一注明了某書系某家藏本，「此彰各家珍貴資益之善」（《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諭），使許多的藏書家得以名列欽定鴻編，垂遠史冊。無疑，這是歷代藏書家從未享受過的至高殊榮，也是藏書家社會地位達到歷史頂峯的標識。在一系列血腥的文字獄中飽受驚嚇、無所適從的文人學者由此發現「柳暗花明」的前景，受到莫大的鼓舞和激勵，於是有更多的人以更大的熱情投入到藏書活動中去。乾嘉時期盛極一時的私家藏書高潮的出現，與乾隆權威莫比的大力倡導關係至大。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人；乾隆

皇帝賞藏書，滿天下便皆以藏書為時髦，為榮耀了。

(二)乾隆樹起了私家藏書樓的一杆欽定旗幟——寧波天一閣。歷來自生自滅、群龍無首的私家藏書樓，多少年來互有交往、利用、合作，也互有攀比、競爭，但一直各行其是，缺失看齊的目標、追趕的對象。深居紫禁城的天子居然於日理萬機之暇洞察下情，發現了這個民間典型。乾隆三十九年諭稱：「……如浙江范懋柱等家，其蒐集收藏，深可嘉尚。」已經將天一閣看作是私家藏書樓的代表了。乾隆四十年御制《文源閣記》中稱：「藏書家頗多，而必以浙之範氏天一閣為巨擘」。一言九鼎，一錘定音。無容置疑地推崇天一閣為藏書第一家，天下第一樓。儘管此前天一閣名聲已漸漸傳開，但其影響尚限於江南地區，甚至，江南一帶的不少藏書家對天一閣也並非十分看重。乾隆欽定樣板，並且親自下旨四庫七閣無一例外都要仿造天一閣後，天一閣方聲名大振，天下景仰思齊，許多藏書家遂紛紛以天一閣為榜樣，其建築、其藏書特色、其保護措施、其管理模式，乃至命名方式全都有了仿效對象。天一閣作為古代私家藏書樓典型輝煌迄今，足見乾隆卓識遠見。

(三)乾隆建江南三閣頒藏《四庫全書》。這是乾隆鼓勵、支持江南地區私家藏書的切實而極有效的舉措。所以選中江南集中建造三閣，並允士子借閱，乃是乾隆因勢利導、重點扶持策略之體現，在當時書源較為緊缺的形勢下，江南三閣的藏書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為周邊區域的讀書人、藏書家提供了豐富的書源。以至在許多藏書樓如瞿氏鐵琴銅劍樓、顧氏藝海樓、孫氏平津館、何氏夢花館等皆以多藏閣抄本著稱。因此，江南三閣的建立與開放不僅為江南地區私家藏書的發達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支持，也對私家藏書樓的開放產生較為積極的影響。



五、私家藏書樓的發展並未隨封建王朝的終結而嘎止

巨大的歷史慣性使私家藏書樓在進入民國後又滑行了一段路程，並出現回光返照式的短期繁榮。傅增湘之藏園，劉承干之嘉業堂藏書樓、李盛鐸之木犀軒等大家無論藏書規模、質量均顯後來居上之勢，然多來去匆匆，壽限短促。

歷代私家藏書系統的發展呈現以下幾個明顯的特徵：

(一) 私家藏書是所有藏書系統中發展最快、規模最大的系統，時代越後，藏書家數量越多，藏書樓規模越大。並且，藏書家的身份由早期以貴戚大僚為主，越來越多地下移至普通士人布衣，藏書總量與朝廷藏書相比越來越佔壓倒優勢。私家藏書構成了我國古代藏書的基礎。

(二) 私家藏書的發達與地域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出版業發達程度密切相關，而與國家的政治中心關係相對薄弱，唐以後這種現象表現得尤為顯著。漢以降私藏中心逐漸由西向東南轉移，逐漸地遠離政治中心，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私家藏書事業持續繁榮，風景獨好的事實很能說明這一點。

(三) 個體地看，私家藏書樓的壽限普遍較短，少則十數年，多則數十年，鮮有超過三代百年者。天一閣的著名正可證明其是古代藏書樓中極少長壽的鳳毛麟角。但宏觀地看，私家藏書系統的生存機制極強，其分散零藏、彼此散聚、頻繁兼並的特色，使其具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堅強韌性及「西方不亮東方亮」的廣泛可適性。

(四) 私家藏書因其立足民間，為數不少藏書家具有開明識見，使其較之官府藏書具有更大的開放性和公益性。儘管，秘藏吝借的藏書家歷代多有。

參、官私藏書之間的影響

古代藏書事業的各個系統之間有著必然的或多或少的關聯與相互影響，尤其是兩個主要的系統官府藏書與私家藏書之間。

在藏書來源方面，官藏與私藏各自從對方獲得補充和支持。漢代以後歷代政府向民間屢次徵書即是官府藏書獲取私藏支持的例證。歷代戰亂或政權更迭後大傷元氣的皇家藏書體系多賴民間眾多藏書家聚沙成塔般的支持而得以重振聲勢，後來居上。而私家藏書則通過獲得朝廷賜書或借抄皇家秘閣藏書等途徑不斷地豐富內容擴大規模。

在藏書制度、藏書技術等，歷代藏書家從皇家藏書的管理中學習，借鑒了諸如藏書分類、目錄、排架、整理等方法，使歷代看似一盤散沙各行其是的大小形形色色的私人藏書樓在事實上有一只無形的大手在指引著方向，不斷地追隨官府藏書的步伐而日益趨同。而私人藏書家在書目編制、藏書鑒跋、藏書樓建築等方面的種種創新又反過來影響和完善著皇家藏書制度，如宋代目錄四杰晁公武、陳振孫、尤袤、鄭樵等各自在書目編制方面的非凡成就均對後世官藏書目及國家書目的編制產生相當影響。又如清乾隆時期皇家四庫七閣建築以天一閣為樣版仿造也實在是最好不過的證明。

肆、藏書家的歷史貢獻

歷代的藏書事業，無論官藏、私藏或是寺觀藏書、書院藏書均對中華文明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這應是確定無疑的事實。然而，恰恰又是這看似鐵定的事實在近代以來的諸多學者中却見仁見智、或褒或貶，紛爭不斷。舉個極端的例子，私家藏書秘惜不宜，旋聚旋散的現象，在許多著述中是被當作一種罪責看



待的，不少的藏書家也由此列歸歷史罪人。所以如此的理由說來十分簡單：既然你藏了書，就該向公眾開放，就該持之以恆代代不散，否則，因為你的聚藏而使別人看不到藏書，而使藏書集中毀散，你便有過失罪責，便愧對前朝當世後代。在學人的喋喋紛爭中，對國歷代藏書的功過是非這一重大問題却遲遲不能給出一個大致公允的、合乎歷史事實的明確說法。蓋棺不能論定，這或許不僅僅是歷代藏書家的不幸，也是當今學術界的悲哀。

探討藏書事業的歷史作用，若抽象泛言之，則可以說其對我國歷代的文化、教育事業無疑起著一定的推動和促進作用，對國民素養的提高產生積極影響。還應該提及的一點是，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中的兩大發明即紙和印刷術的發明，藏書事業在其中的催化和促進作用實在應予充分的肯定。發明源於需求，正是緣於社會對書籍的廣泛而大量的迫切需求，正是在以官、私藏書樓為主體的巨大需求市場的刺激下，紙和印刷術的發明才得以萌發並逐漸成熟、廣泛應用。歷史清楚地顯示，宋代及宋以前的書籍市場始終處於供不應求的飢渴狀態，處於一種典型的供方市場，直至明清版刻大盛，才逐步扭轉這種狀況。歷代大大小小的無數藏書家在汲汲忙碌於收書、藏書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充當了偉大發明的催生婆——一個光榮的角色，一份集體的榮譽。

藏書家的歷史作為是一種客觀存在，不同的考驗角度得到的會是不同的結果，我們將視角固定在圖書典籍上，不難發現，藏書家的貢獻集中體現在對中國歷代典籍的保存、傳播、完善與生產上。

一、貢獻之一：典籍的保存

這在秦漢時期即已有顯著表現，秦始皇焚書坑儒及隨後的嚴厲禁錮政策，使古代典籍遭受第

一次大規模毀損，如此高壓血腥之下仍有許多的藏書家敢冒殺頭危險將大量禁書藏於夾牆、地窖、山洞等處，為中國典籍的流傳保存了至為寶貴的火種。西漢武帝首開徵書之路。徵集的對象主要便是這批民間藏書。「百年之後，書積如丘山」。也正是這批珍貴的先秦遺藏，奠定了漢王朝國家藏書的基礎，並由此繁衍出以後歷代無數的典籍，說藏書家的貢獻巍如丘山，實不過份。

再以宋元刻本為例，今天保留下來的數以千百計的宋元刻本，它們中的每一種每一冊都是歷經眾多有名無名的藏書家之手，如接力賽一般層層遞傳下來的，盡管在遞傳過程中因種種天災人禍可能毀損慘重。但這恰恰又說明了藏書保存的極大不易與艱巨，以單一藏書樓論，寧波天一閣是一個典籍保存的範例。雖有《四庫全書》徵書，近代失盜等重大減失因素，天一閣歷經四百餘年保存下來的明代地方志、登科錄等大量明代典籍在當今世界仍是獨一無二的孤本。清末杭州丁申、丁丙兄弟冒戰亂烽火奮不顧身搶救出大量文瀾閣《四庫全書》的業績，更是突現了藏書家不畏犧牲、無私奉獻的崇高品格。江南三閣，文瀾獨存，這實在是藏書家樹起的一座豐碑。

二、貢獻之二：典籍的流播

主要可從三個方面來看，一是借閱之途：從北宋的李氏山房到清末的古越藏書樓，不少的藏書家通過向公眾、社會形式，捐私產為公益，以傳布為己任，使一家之藏為眾人所用，極大地擴大了典籍的受眾面與利用率，也促進了知識的傳播。

二是借抄之途：從借出方看，藏有者不以珍稀為秘，無私提供底本，使一書由此而複製出更多的副本。在古代通訊、交通俱不發達的條件下，通過許多人的輾轉借抄，一本書不僅可以化作千百本，還可以跨越時空的阻隔而四處傳播。



從借抄方看，歷代幾乎所有的藏書家都借抄過書，許多人借抄的書數以千計。他們或抄自官藏，或源從私家，或親自動手，或僱人代勞，千方百計，孜孜以求，借抄的目的或許僅為豐和增加自己的藏書，但成百上千的藏書家經年累月的抄寫，其積少成多，聚沙成塔的威力該有何等大！無數雙抄書的手匯合猶如開動了一架永不停歇的印刷機，為我們這個文明古國源源不斷地生產出無數的抄本書來。這種「無意插柳柳成蔭」的效應極大地豐富了民間私藏，增加了我國典籍抗災禍能力，以致當許多書的刻本毀滅絕跡時，惟賴抄本書的存在而得再續流傳。明代汲古閣影宋本及其他藏書樓的不少影宋本保留了許多已失傳宋刻本的面貌也是很好的證明。

三是刊印之途，中國古代的出版業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這便是刻印書依據手稿的不多，而以現成圖書為樣本的却占有很大比例。於是，藏書家便擁有了刻印書的重要資本，因此，歷代出版家中藏書家占據了甚大比例和重要地位。五代後蜀的毋昭裔由藏書而刻書，開了一個漂亮的先例，此後，歷代藏書家中多有熱衷於書籍刻印者，明代的毛晉、范欽、清代的鮑廷博、納蘭性德、黃丕烈乃至民國的劉承干等既是藏書巨擘，又都是出版大戶，他們各自利用豐厚的藏書，富足的資財刻印了品種繁多，質量甚佳的圖書。藏書家刻書應該說古代中國的一個特色和好傳統，它對於我國歷代典籍的延續與傳播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有一些藏書家受自身條件限制，有刻書之心而無刻書之力，他們能走的便是奔走呼號，竭力倡言有力者刊行傳布。清代的黃俞邨、周雪客是為典型代表，他們為使珍籍得到廣泛流通，不致因意外災禍而一朝湮滅，在自己無力刊刻的情況下，精心挑選了家藏中罕見流傳的珍秘之書 96 種編成書目，聯合向全社會公告徵求刊刻者，表示願無償提供家藏珍本為刊刻底

本，有意者可任意選刻一種、數種或數十種。“各隨所好，共集大成，不但表彰前賢，抑且嘉惠來者”。這就是著名的《徵刻唐宋秘本書目》的由來。該書目自發布後，響應甚眾，納蘭性德刻《通志堂經解》取其 22 種經書刊行，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也選其 9 種珍本刻之，甚至連皇家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也慕名前往，按書目選取了不少史子類珍籍刊刻。確實，在許多的藏書家心目中，刊刻古籍是流布藏書的最佳形式，也是服務社會、留芳百世的至高境界。清人張海鵬認為「藏書不如讀書，讀書不如刻書，讀書只以為己，刻書可以澤人」。晚清著名儒將張之洞的《勸刻書說》反映的也正是這種藏而刻書利他惠人的高尚境界。

三、貢獻之三：典籍的完美

仁人愛物，珍惜字紙可以說是我國儒家文化的一種悠久傳統，體現在藏書家身上，便是普遍的毫無例外的對圖書的寶愛、珍惜、視若生命、護如眼目的情結。歸結起來，歷代藏書家對圖書從形式到內容的完美追求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圖書的愛護

遠在北齊時代，《顏氏家訓》中「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的訓誡便已明確提出將愛護圖書視為士大夫必備美德之一。宋代的司馬光「所讀之書終身如新」，也在於其愛護書的萬分用心，如几案必潔淨，翻閱務輕柔，捧讀必填襯方板以防手汗污漬、揉傷紙張。元代的趙孟頫更總結了讀書護書「八勿四隨」的真經，即「勿卷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藏書家如明之邵寶、姚咨，清之汪憲、楊繼振等均將《顏氏家訓》或趙孟頫上述誠語刻成藏書章鈐於自家的藏書，也表露了他們心同前



賢、珍惜典籍的心情。更有許多的藏書家以「性命輕至寶重」、「後人觀之宜加珍護」、「愿流傳勿污損」、「勿恣意塗竄」、「凡我子孫宜珍惜寶愛」等印文警示同仁後世務必寶惜典籍。至於像毛晉祈禱「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黃丕烈年年祭書祈求天助神佑，張蓉鏡在宋版書上用鮮血書「佛」、書「南無阿彌陀佛」、「惟願流傳永久，無水火蠹食之災」，江標刻長恩像藏書印乞求神靈護佑，孫從添置春宮畫於書櫃內以驅蠹蟲等做法，雖不無迷信、愚昧之處，但也從另一角度反映了這些藏書家護書惜書如痴如狂的極致心態。對不可知的天災人禍蟲害的畏懼與無奈迫使他們於深深的愛戀與惶恐交織中出此下策，企求以萬分的虔誠感動蒼天神靈護佑自家藏書平安。

爲了保護藏書的完好，更多的藏書家以積極主動的姿態從民間汲取智慧爲己所用，種種圖書保護方法遂不斷創出，有些並一直被襲用到現代，如古籍的曝書及中草藥防蟲等。早在宋代，藏書家趙元考即採用寒食面與臘月雪水調和粘書，據說此法可以使書不蠹。明代的天一閣及其它一些書樓則一直採用藝草夾書以防蟲。清人方功惠藏書必以東丹箋作副葉，因其可以避蠹。孫從添《藏書紀要》則詳盡介紹了皂角炒末可避鼠害，炭屑、石灰、鍋鏽鋪地以驅白蟻等藏書保護方法。葉德輝用以避蟲蟻的則是雄黃、石灰等物。陸烜修補古書別有心得，其《梅谷隨筆》中介紹：「修補古書，漿粘中必入白芨，則歲久不脫」。黃丕烈頗爲獨創的書籍「復背護持法」自得，他認爲古書經如此處理可增強牢固度，不致因頻繁取閱而損毀。

藏書家並普遍重視的藏書的裝潢，把這看作是保護珍籍善本的一種有效措施。許多時候，書籍的裝潢費往往超過買書價，藏書家在這一點上驚人的豁慷慨換得的是典籍的美備與新生。如宋版《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一書，黃丕烈購得時

破爛特甚，蠹魚數以百計，缺葉及無字處每冊俱有，黃遂擇良工精加裝潢，費時近兩年始補裝一新，其工費已倍於買書價而達百餘兩銀。而黃丕烈爲元刻本《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一書支付的裱托裝潢費更高達購書價的數十倍。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許多的古籍假如沒有藏書家及時、精心地妥加整補裝潢，或許早在數百年前便絕滅人間了。

(二) 針對圖書內容的校勘補正

由於歷代輾轉抄寫或刊刻的誤失，古書中幾乎沒有不出錯訛的，「無錯不成書」之諺即是這一現象的歸納。對此現象，幾乎所有有能力的藏書家都會自覺而欣然地擔當起校書糾誤的職責。他們基本以自家藏書爲校勘對象，或孤單奮戰，或相互切磋，長年累月地進行著無休無止的校書工作。可以說藏書校勘是藏書家普遍也是最艱巨最乏味的日常性工作之一，卻偏偏有那麼許多的藏書家樂此不疲，老死無悔，這便是精神的力量所在。正是對典籍負責，對子孫負責的崇高的使命感支撐著無數的藏書家默默無聞地屹於陳編爛簡中，從事著這種爲人作嫁衣的苦差。歷代藏書家辛勤校勘古籍、補闕訂訛的事例實在不勝例舉。僅在清代，藏書家中精擅校勘、成果顯著者便有顧廣圻、何焯、錢大昕、黃丕烈、吳槎客等不少人。如顧廣圻，這位清代校書第一大家，一生中校書無數，黃丕烈、孫星衍等諸多名家的藏書特別是刊刻之書多委其精校，以確保所刻書之高品質。夏寶在其《墓志銘》中稱其「去校最精，爲當世所貴。……補亡糾繆，頓還舊觀，有功於古人甚鉅。」是爲確評。如吳槎客，同時代的黃丕烈贊其「藏書甚富，考核尤精」，常與同好切磋探析古籍中的疑誤。如黃廷鑾，自述「余三十年來所校古籍不下五六十種」，爲的是「從訛謬中力開真面」，恢復古書本來面貌。五六十種書的校勘確實不是一個小數目，須知，爲一種



古籍的校勘，許多的藏書家往往需埋首故紙、昏天黑地地耗費數年的光陰。明代的趙用賢為校五卷本的《洛陽伽藍記》，先後用了八年時間，以五種不同本子校去，共改正誤訛增補遺漏 860 餘字，方使這本不算太厚的書成為完本。無獨有偶，清人周叔平校《三朝北盟會編》一書也用了七、八年時間，同樣的備嘗艱辛。其好友王春敷述其校書緣由稱：周叔平「於此書尤珍惜之，而恨其魚魯帝虎，前後錯雜，幾不可句讀。因博訪藏書家有是書者，不憚委曲借校，如也是園藏本、東皋柏先生藏本、及浦氏、仲氏諸家本，互有是非，從其是，雍其非，前後積七八年訂訛補闕之功，始得文從字順，可謂勒矣」。(霍良士《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卷二)他如黃丕烈之校《國語》、嚴可均之校《商子》等，俱是數年艱辛，一朝美備。精校出善本，流傳至今的歷代典籍，其字裏行間無不浸透著藏書家的心血汗水。

(三)對殘缺圖書的搜訪集全

對歷史留傳因種種原因導致殘缺不全的圖書，許多的藏書家總是瀝盡心血，刻意覓訪，冀期以自己的誠意與努力使盡可能多的殘書在自山手裡破鏡重圓、完美再現。陸儼山、黃丕烈的言論可以說是藏書家普遍心聲的代表，明人陸儼山稱其之藏書即使殘書亦收，以冀他日之偶全。黃丕烈在解釋自己何以重視收購破爛不全之書時說：「不全者或待殘缺之補也」。「如遇不全本而棄之，從此無完日矣。故余於殘缺者尤加意焉，戲自號曰『抱守老人』」。「《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一，卷六」天降大任，藏書家眾心一致地將拾殘補闕當作自己義不容辭的神聖職責。明代的趙琦美購得李誠《營造法式》殘軼一部，中缺十餘卷，為補全此書，其從此心存塊壘，寢食不寧，仆遍訪於藏書名家、書肆、秘閣，艱辛曲折歷時二十餘年，終使該書幸得延津之合，臻於完美。徐勃舊藏《輟耕錄》一書，缺第一冊，其苦

覓之十數載無以補全，最後在友人高景倩幫助下，於所購雜書中找到該書半部殘本，配成完書。又，其家藏《藝文類聚》缺四冊，「每有查考輒恨其摧殘非完書也」。也是經本人不懈蒐訪，數年間戈搜購自書攤，或受贈於友朋，終以三殘本成一完書。徐氏藏書中經其拾殘合全的書尚有《華陽國志》、《何氏語林》等不少。

在清代，錢謙益藏宋版《後漢書》缺兩冊，郁禮藏厲鶚《遼史拾遺》手稿少 50 葉，兩書最終得以分別復原也多賴書主留意遍訪，從面鋪、街頭搶救出被當作廢紙的殘餘，傳下了合浦珠還的書界佳話，法式善從老嫗補窗破紙中撿得明萬歷二十五年順天鄉試錄三十九葉殘餘，雖未能補全，但其拾殘惜書的精神同樣值得贊賞。

四、貢獻之四：典籍的生產

即指利用藏書在治學探索的基礎上，以著述、匯編等形式創造出新的典籍，為民族文化增添新的內容、新的財富，提供更多積累。在這一點上官私藏書樓均成果斐然，各有千秋，以官府藏書講，歷代諸多類書如唐之《藝文類聚》、《初學記》、宋之《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冊府元龜》、明之《永樂大典》，清之《古今圖書集成》、《佩文韻府》等長編巨制無一不是直接利用藏書的產物。以私家藏書論，歷代藏書家艱辛搜訪、精心匯編的專題巨著如朱彝尊《詞綜》、黃宗羲《明文海》、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張月霄《金文最》等，及大量的地方文獻匯編如《四明叢書》、《金華業書》等，均是利用藏書的顯著成果。著述方面，如葉夢得、鄭樵、趙孟頫、王世貞、歸有光、胡應麟、胡震亨、談遷、顧炎武、黃宗羲、錢謙益、朱彝尊、杭世駿、全祖望、萬斯同等大家名篇迭出、著述等身，俱系利用藏書的巨大支持而各鑄輝煌，名重文壇學界。至於清代編修《四庫全書》



這一劃時代的鴻編，更是官、私藏書樓各逞所長、珠聯璧合、共襄其成的範例。

五、貢獻之五：典籍的捐公

進入現代，眾多的私人藏書家愛國為公、服務民眾的意識更加強烈而自覺，他們紛紛以私藏捐奉國有，難以數計的私家藏書遂以百川歸海之勢匯聚各級各地公共圖書館，學校圖書館等國有圖書收藏機構，藏書家以自己慷慨無私的壯舉為中國私家藏書樓的歷史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那些捐獻私藏的可敬可佩的現代藏書家實在有太多太多，他們的光榮代表中有：

梁鼎芬，1919年卒後由其子捐獻藏書600餘箱給廣東省立圖書館。

梁啟超，1929年卒後其飲冰室4萬餘冊遺藏永遠寄存北平圖書館。

傅增湘，1949年卒後其雙鑒樓藏書分別捐獻北京圖書館、四川大學圖書館。

周叔強，建國後先後五次共向國家捐獻藏書九萬六千餘冊。

潘世茲，1951年將其父寶禮堂全部宋版珍本從香港運回，捐獻北京圖書館。

此外，如胡朴安、葉景葵、徐行可、李子廉、李文漢、蔡敬襄等人的藏書分別捐入了上海圖書館、湖北省圖書館、雲南省圖書館、江西省圖書館等。

在浙江，留存現代的著名藏書樓如範氏天一閣、劉氏嘉業堂、孫氏玉海樓、黃氏五桂樓、馮

氏伏跗室、朱氏別宥齋、余氏寒柯堂、李氏萱蔭樓、王氏治莊樓、張氏鐵如意館等數以百計的私家藏書樓在建國後踴躍將各自的珍藏乃至自家藏書樓捐獻國家，浙江圖書館豐富而具特色的古籍藏書中，私家藏書的捐贈構成了主要的基礎。

清末，陸樹藩將函宋樓珍藏頃數售予日本靜嘉堂文庫，令國人疾首扼腕，痛惜不已。這一世紀悲劇從反面警醒、激發了無數藏書家的愛國、愛民族的情感，隨後不久丁氏八千卷樓藏書售歸江南圖書館的事例便是鮮明的參照。對許多以各種方式將藏書售予各類國有圖書館的藏書家，人們同樣抱有敬意與感激。

私家藏書樓的歷史使命因現代圖書館的崛起而結束，私家藏書樓的生命却因融入了現代圖書館而永續延綿、生機無限，私家藏書的作用與貢獻也因此無有窮盡。

用這些篇幅來例證、表彰歷代藏書家對中華典籍保存、護惜、流傳之功德，並不意味一好百好，對其歷史的局限、人格的弱點視而不見或塗脂粉飾，恰恰相反，正是為了全面地、歷史地、恰如其份地評價藏書家的作用，才必須理直氣壯，實話實說。先前對於藏書家的歷史貢獻的表述太過簡略、空泛，而對於藏書家的一些缺失則似過多顯誇、過多指責、過多苛求。藏書家中較為普遍存在的秘惜吝借等缺失相對於他們的歷史貢獻而言，只是大河中的支流，森林中的灌木。

(收稿日期：1999年10月26日)

